

第三十四章 失憶的一代



2019年6月3日，即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前夕，位於台灣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園內的自由廣場，出現了「綠色坦克與白衣黑褲」男子的充氣氣球，用來紀念「坦克人」王維林隻身抵擋坦克車前進一事。（見圖）自由廣場向來是中國大陸遊客訪台必到景點，我們看到不少中國遊客開心與「坦克人」合照，看來他們完全不知道這是一段令人震驚和悲痛事蹟的標記！

1989年4月中旬，中國大陸高校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起悼念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並要求當局解決貪腐問題，進行民主改革。這運動持續了7個星期之久。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和人民警察在天安門廣場對示威集會的學生進行武力清場行動，其後中國當局更展開大規模逮捕。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事隔了32年，六四事件仍有不少懸謎。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在這7個星期中，超過100萬人曾參與在天安門廣場的集會，除了學生外，還有各行各業北京居民；不但如此，在中國各地400多個城市也爆發規模不一的抗議活動，其中以四川的成都至為注目。

事實上，在此期間，全世界各大城市都舉行大遊行，支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起初，不少人都持著希望，以為這一定帶來中國大改革，邁向民主的路程，誰料發展至1989年5月20日，總理李鵬簽署戒嚴令，實施戒嚴，軍隊開始進城，北京市民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阻止軍隊進城。此時北京郊區已經發生一些零星的流血衝突，當局亦同時把這運動定性為「動亂」。在同一日晚上，颱風布倫達吹襲香港，天文台掛起8號風球，但當晚仍有4萬多港人冒著大風大雨，來到維多利亞公園集會，並遊行至位在灣仔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翌日，有超過150萬人遊行，支聯會就在當日成立。遊行人士由遮打道行人專用區出發，途經新華社，最後抵達維多利亞公園。遊行持續達8小時，直到晚上10時才結束。

我那天接到香港一些弟兄姊妹來電，他們情緒都非常激動，聲淚俱下，分享他們目睹這和平集會之感受。當時他們仍然抱著極樂觀的態度，期待著一個歷史的大改變！我們在三藩市的教會也舉行特別的祈禱會，我從沒有見過教會有這麼多人參加祈禱會，而且又是這麼熱切的，心受激勵，但在我心底裏，卻存著一個極大的憂慮，總覺得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6月3日晚上，解放軍開始在天安門以實彈射擊從西側和南側進入廣場的學生，當時仍有7萬至8萬人留在廣場。到了6月4日凌晨4點半，解放軍開始四面八方逼近，而在廣場的學生亦開始撤離。據一些撤離的學生聲稱，軍隊在紀念碑北面架起機槍向學生掃射，最後軍隊已控制整個廣場及北京市區。

6月5日，正當18輛坦克車準備駛入天安門廣場繼續清場，一名男子在長安街上隻身阻擋解放軍坦克車前進，儘管領頭的坦克駕駛員一度試圖轉向繞過，但是仍然遭到該名男子攔阻，他更爬上坦克塔，並和駕駛員溝通。最後他被幾名身穿藍衣人士帶離現場。整個過程都被美聯社記者Jeff Widener攝錄下來，隨即在國際間各新聞媒體廣傳，這男子就是我們所說的「坦克人」。

究竟這男子是誰？他的下落又如何？如今仍是一個謎。有些人相信他的名字叫「王維林」（英國《星期日快報》最先報導），他是19歲的學生，在當天遭中國政府以「政治流氓」和「企圖推翻中國人民解放軍」等罪名起訴，但亦有人以為他是一名工廠工人，後來被處死。總之眾說紛紜，有人認為他還活著，有人卻以為他已死了。吊詭的地方是：這些當事人也隨著坦克人一起消失了！可悲的是千千萬萬人的夢想，以為中國會邁向民主的路程，也隨著「坦克人」已消逝了。然而，更可悲的是：在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心中，這件觸目驚心的慘劇竟然也徹底地消失了，好像中國這一代人是集體失憶似的。不少人作調查，在今日中國境內的大學生中，能認出「王維林」坦克人這照片的不及15%，而這15%中大多數都不願再提及這敏感政治議題。著名的美籍猶太裔作家Elie Weisel曾說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我有機會重返昔日家鄉波蘭，與當地人傾談，令我感到非常悲傷的一件事，這些波蘭人竟然完全忘記在不久之前猶太人在波蘭遭德軍大屠殺，他們竟忘得一乾二淨；這一回，他們真的在腦袋中把猶太死難者再一次徹底地屠殺！這令我感到悲憤和不安！」

曾為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派駐北京7年的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在六四事件25周年時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了「重返天安門」一書，這書的附題是：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六四的歷史真相(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Tiananmen Revisited)，這書的中文版是於2019年出版，在中國是禁書。林慕蓮所採用的書名真是可圈可點。當然，她所謂「天安門」是指六四事件，而她更巧妙地描繪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失憶的人民共和國。翻開中國歷史看，天安門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此廣場建於明朝永樂十五年(1417年)，面積44萬平方米，在這100年，發生了不少重大事件：

☞ • 1919年：五四運動。北京學生抗議巴黎和談有關山東省問題的決議，作為第一次大戰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竟然被迫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惹起中國人的憤怒。

• 1926年：三一八慘案。三一八慘案是中國學生運動史上一場政府屠殺學生和平民大慘案。魯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名《紀念劉和珍君》，並形容三一八慘案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事緣是這樣的：1926年3月12日，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奉系軍閥作戰期間，日本軍艦掩護奉軍，駛進天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守軍死傷十餘名，國民軍堅決還擊，將日本軍艦逐出大沽口，日本竟然聯合英美八國於16日向當時執政的段祺瑞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要求。這引起全國憤怒，3月18日，北京5,000多人，其中以學生為主，在天安門集會抗議，要求政府拒絕八國通牒。

集會結束後，李大釗率領隊伍，從天安門出發，經長安街，進入獅子胡同(即今日的張自忠路)，在段祺瑞政府門前請願，其中一位是國立女子高等師範大學的高材生及學生領袖劉和珍。當時段祺瑞不在，軍警恐怕失控，就用武力驅散示威隊伍，並開槍射學生們，結果47人死亡，200多人受傷，其中一名死者

便是劉和珍。在場的軍警把她的財物掠走，甚至連衣服也剝光。魯迅的文章大肆抨擊腐化的北洋政府。

時至今天，歷史學者也無法決定是誰下令開槍，雖然我們無法證明段祺瑞是幕後黑手，但這慘案肯定是與他有絕大的關連，所以當時學者，如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梁啟超、傅斯年紛紛斥責段祺瑞政府。最終一個月後，段祺瑞頂不住強大的國內外壓力而倒台。

鮮為人知，而極弔詭的地方：就是在1989年天安門學生被屠殺中，其中一名被槍殺身亡的死者是清華大學生段昌隆，段祺瑞就是他的叔祖父，家人把他葬在段祺瑞之墓旁！

- 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多次接見從中國大陸各地來的紅衛兵。
- 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

”

自1991年，政府企圖改造天安門的形象，每天都讓群眾進入天安門觀看升旗儀式，每天都有2萬至3萬人觀看，節日則更多，每年國慶觀看人數都在10萬以上，以下是一個遊客參觀完升旗禮後的感想：

「我們3時許便起來，睡眠惺忪地登車前往，到達天安門廣場後，在飢寒交迫的情況下(因為沒有吃早餐)，等待儀式開始。國旗及國歌是代表國家，當升國旗，唱國歌的時候，人民便會感到十分光榮，所以當激昂的國歌奏起時，心中不禁感到身為中國人的驕傲，回想起昔日的中國，只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現在的中國已越來越強大，中國已不再被別國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欺負的對象，中國人亦已站起來，已成為世界的強國，目睹國家之興盛，我們激動的心情，仍久久未能平復！」

但對一些還沒有失憶的人士來說，他們卻在廣場想起六四時被屠殺的青年人，聽到國歌時也想到作者田漢的淒慘遭遇，心中真不好受！但無論如何，政府在改造天安門的形象上是相當成功的，林慕蓮稱之為失憶的人民共和國，雖不中亦不遠矣！然而，雖是面對著政府龐大的宣傳，嚴苛的政治壓力，有不少人仍勇敢地把六四的真相揭露出來。在齊有太史簡，在晉有董狐筆，在今天的中國，林慕蓮就要重返天安門，追訪一些目擊証人，喚醒那些失憶人士！

陳光是一個17歲的小兵。李鵬在5月19日宣佈實施戒嚴令後，隨著部隊進城，預備趕散天安門廣場的人群。但部隊離開軍營不夠數里，便有數以千計的群眾阻擋去路，令他們的軍車寸步難行，更令陳光感到驚訝的，這些學生及市民並沒有粗暴抵抗，而是友善的與士兵講道理，內中更有一些長者，陳明他們並非暴徒，更沒有任何動機反抗政府，而是抗議國內貪腐問題，並且促使國家走上民主路程。陳光完全想像不到，這完全不是一個騷亂的場面，這些所謂「暴徒」是非常友善和斯文，與他在部隊所聽到的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部隊與群眾對峙了3、4天，明顯的，部隊司令不知所措，也不知如何處理這局面，這些士兵在軍車內，既飢餓，又疲累，起初他們拒絕接受群眾送上的食物和食水，但後來他們忍受不住，更何況那些群眾的熱情和誠懇，取得不少士兵的歡心，開始接受送上來的即食麵、麵包、生果和飲品。如此，這些本來清場的士兵，竟然好像與那些群眾站在同一的陣線。最後，上級有命令下來，所有進城的部隊都要撤回郊外的軍營。

到了6月3日，部隊士兵接到上級命令再次進城，這回他們改變策略，

所有士兵都不許穿上軍裝，而是便裝乘搭公車進城，讓群眾不知也不覺有千萬士兵暗暗地進入了天安門廣場。由於陳光身體不適，要服用抗生素，於是便被安排坐在一輛改裝了的公車上，車上的座位全被拆除，留下空位載滿了槍枝和彈藥，他發覺車內除了司機外，只有他一個乘客，路上通行無阻，沒有群眾阻止，他在下午3時30分便抵達人民大會堂，便把車內的武器轉運入內。到了6時許，部隊齊集在人民大會堂，獲派發槍枝及子彈，到了6月4日凌晨許，士兵離開會堂，在廣場進行清場工作，而陳光則被派往拍攝清場情況。此時在廣場的學生，開始撤離，他跑到屋頂，望著士兵推進，亦聽見槍聲、喊聲，但由於距離較遠，他沒有看到這些槍擊是指向人群，抑或示警訊號，但他返回大會堂時，已發現不少受了傷的士兵躺在那兒，接受護理。

到了天亮，陳光發現呈在中的眼前的是一幅戰後的場景，不少被摧毀的汽車仍正在在焚燒，黑煙冒升。士兵亦開始清除廣場物品，包括一堆一堆的帳幕、單車、橫額、個人物品、碎紙等。陳光的責任是拍攝清除的過程，忽然他看到一幅令他困擾多年的情景，他看到一輛被毀的單車之車輪上，竟然夾著一束女孩子的髮辮，還有一條紅色的絲帶束著，明顯這是一個被殺死女孩子遺體的一部份。他呆了一陣，不禁自問：「這女孩子是誰？她現在還活著嗎？」正當那些士兵放火燒毀這些時，他還嗅到秀髮被燒焦的氣味。這幅圖片竟然困擾了他以後的30多年！

1992年，陳光考入著名的北京中央藝術學院，這學院的學生正是六四廣場上民主女神像的創作人。在學院期間，他從沒有告訴任何人他當兵的背景，他一直保存著一部份他拍攝到天安門事件的照片；並按著這些照片劃了不少圖畫，他沒有出售這些作品，也沒有公開，因為他知道這樣只會帶給他極大的麻煩；他只留給自己作為紀念。六四對他影響極大，這幾

十年來，他只把自己隱藏在藝術的世界中，既沒有結婚，也沒有子女，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和他的作品。當林慕蓮問他：「在六四事件中，你有沒有其他選擇的權利呢？」他答道：「我知道我是活在罪咎之中，但我也不知道我有其他選擇的權利，對當時的我來說：上級的命令，我就必須依隨！並沒有其他選項！」

對17歲小兵陳光來說，他以為當時是沒有其他選擇的權利，但對50多歲的徐勤先少將來說，他卻毅然選擇他良心的指引而抗命，但他卻付上了極大的代價。徐勤先早在1950年便加入解放軍，並往朝鮮作戰，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他一直効力解放軍，1987年任陸軍第38集團軍軍長。當他在5月17日接到戒嚴命令，軍隊要往北京清場，他抗命，並致電政委說：「我不參與，這事與我無關。」他曾對朋友說：「寧肯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天安門事件後，他被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被軍事法院判決5年有期徒刑，在秦城監獄服刑。他在2016年病逝，前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李銳賦詩稱許徐將軍：

「懷仁博學真儒將，一代英雄硬脊梁
甘赴刑廷違上命，但求民主大興邦！」

不過，最令我感動的還是天安門母親的精神和勇氣。「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張先玲女士，1989年6月4日凌晨，她19歲的兒子王楠在長安街南口被解放軍射殺身亡，子彈從左上額射入，左耳後穿出。王楠是一個中學生，對政治並沒有多大興趣，但卻熱衷於攝影，當他從公車上看到天安門集會，於是便決定前往廣場拍照。起初，張先玲是阻止他，怕他年幼無知，易被人利用，但王楠卻不以為然，以為學生運動目標正確，而且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到了5月中旬，王楠似乎越來越積極，並表示支持學生絕食抗議。

6月3日晚，他們吃晚餐的時候，王楠問道：「你們以為解放軍會否射殺示威的學生呢？」張先玲答道：「沒有可能，國家軍隊怎會射殺自己的國民，就是文革混亂的時候也不會如此！」到了深夜，她也不敢相信軍隊竟會射殺自己的人民，看看兒子的房間，燈是亮了的，以為他仍在家中，應該是安全的了。怎料到了6月5日早上，她發覺王楠早已離家，並留下一張字條：「媽，我要出外找我的同學！」鄰居告訴張先玲，王楠是在半夜離家的。張先玲等了整日，還不見王楠的蹤影，她真有點担心了，與丈夫到處尋覓，走遍北京24間醫院，但仍找不著，只見間間醫院擠滿了槍傷的人。直至6月14日張先玲收到王楠學校打來的電話，一具遺體看來好像他的兒子，正停放在一間小醫院內。其實他是死了10天，但所有殯儀館都沒有空位，只能把他寄放在這間醫院內。張先玲立即前往認屍，證實就是王楠。她等了足足1個星期，當局才批准她把王楠埋葬。

自此，張先玲感到非常沮喪，失落和內疚。但後來她想通了：王楠是為了把這足以影響整個中國歷史的運動記錄下來而喪失了生命，她就決定繼續她兒子的遺志，追尋六四的真相，把這歷史記錄下來，公諸於世，她先把王楠與其他犧牲者的死亡真相揭露出來，經過她不斷的明查暗訪，8個月後終於找到真相。當6月4日凌晨1時30分，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北角，解放軍開始射殺群眾，一個的士司機目睹王楠衝前拍照，突然子彈飛來，他立即倒地。當時有在旁的百姓企圖扶起他，但遭部隊警告，不准任何人接近。有些士兵把他拖到路旁，一位老婆婆在旁看見了，忍不住乞求那些士兵：「他只是一個小孩子吧了！請救救他！」其中一個士兵對她說：「他是一個暴徒，任何人企圖去幫助他，我會立即開槍！」就在此時，有兩部救傷車趕至，一位穿白袍的醫生跳出，企圖急救王楠和另外兩名傷者，但遭士兵喝令離開，任由這3個傷者躺在路旁，不住流血。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王楠死後8個月，張先玲終於找到其後所發生的事。當晚北京醫院一位實習醫生，與兩個同事自願跑到廣場協助傷者，6月4日早上2時許，他們發現王楠躺在廣場東北角的路旁，奄奄一息。這三位醫生請求士兵帶他入醫院治療，但遭拒絕。他們只能替他包紮傷口，及進行人工呼吸，但他繼續流血不止，終於在3時半斷氣，其他兩個傷者都不治死亡。這時在旁的士兵仍然禁止他們把死者運往醫院，這位醫生只能從王楠身上取出身份證和學生證；並於6時許致電王楠的學校報告死訊。學校得悉死訊，便把王楠葬在學校門前的花園下，但由於草草安葬，屍體亦開始發臭，學校當局便通知衛生局，衛生局派員查實，發現王楠身穿類似軍服，誤以為是軍人，便把他的遺體送到這小醫院中，到了1990年1月，這位醫生拿著王楠的門匙和身份證找上門來，把當時整個情形告之張先玲，她才知王楠遇害的整個過程。

孔夫子說過：「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想不到擁有幾千年文化的中國人，到了今天竟然淪落至此：不是見死不救，而是見死不准人救，令人感到氣憤和悲痛。作為母親的張先玲，是何等的悲痛！她對林慕蓮說：「我企圖不去想這些事，每逢我一起，我就有幾天都不能入睡，我可以想像到在他臨終前的幾個小時，是如何的痛楚，我想到他躺在血泊中，腦裏說著：『媽媽，我覺得很凍，很凍！』」說到這裏，她已是泣不成聲了！

丁子霖與張先玲都是「天安門母親」的創始人。她的兒子蔣捷連是在6月3日11時許在木樨地遭解放軍槍殺死亡，死時只有17歲。丁子霖與其丈夫蔣培坤都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同是天安門母親的重要成員，丁子霖更是第一代發言人。

據丁子霖在2014年所寫的一篇文章《生于多難，殤于一瞬---懷念連兒罹難25周年》一文所述：

6月3日那一天晚上，我們從電視裡看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說是政府有什麼行動，要求全市居民待在家裡，否則一切後果自負。兒子一聽那個緊急通告，無法安心下來了，焦急地問我們：「怎麼辦？怎麼辦？天安門廣場還有這麼多大學生呢？」我回答他說：「沒有別的辦法，除非北京市民傾城出動上街，去廣場，但現時不可能做到。」我勸告他：「外面太危險，不要再出去了！」但他覺得我太怯懦，他用奧運會運動員一句話回答我：「重要的不在行動，而在參與！」說罷，他轉身輕輕地吻了一下我的面頰，說了一聲：訣別吧！我萬萬想不到，這一次兒子的出走竟是我們母子的永訣。在4日的早上6點多鐘的時候，一位學生模樣的青年人由他父親陪同來到我們家門口，他說是我兒子的同班同學。他告訴我們：蔣捷連受了重傷，流了許多血，已被送往醫院，但不知是在哪家醫院。接著，他向我們講述了事情的經過。

3日晚上，他和當晚離家出走的捷連來到木樨橋頭時，看到那裡滿大街都是人，而橋西頭的大街，盡是裝甲運兵車和一隊隊荷槍實彈的戒嚴部隊士兵，整條路都被堵塞了，車輛和行人無法通行。正當此時，部隊開槍，機槍和自動槍的掃射猛烈，突然一顆子彈射中了蔣捷連的背後，蔣捷連對他說：「我可能中彈了！你先去吧！」隨即倒卧在地，鮮血浸透了身上的恤衫。

6月4日的北京，猶如經歷了一場慘烈的戰禍，先前那响遍夜空的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吶喊聲已經停息，但四處仍不斷有零星的流彈呼嘯而過；
一路上到處是瀰漫的硝煙，到處是丟棄的坦克和軍車，
到處是流淌著血污.....那馬路兩旁的樹木、花草、房屋，
所有一切，似乎都低著頭，在這慘遭災禍的古城哭泣、流淚。

這些悲痛的遭遇把天安門的母親聯結起來，據張先玲回憶說：當年總理李鵬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六四死亡人數和名單時，稱家屬不願公佈人名，她和丁子霖聽了後非常反感，就開始聯手組織天安門母親，除了丁子霖、張先玲外，還有失去了丈夫楊明湖的尤維潔。她們要求「真相、賠償、問責」，追求公義的代價。

1994年，丁子霖和張先玲已聯終到96名死難家屬及49名因六四受傷致殘的見證者，透過香港傳媒公佈死傷者名單。1995年，她們以「天安門母親」的名義向全國人大發公開信，要求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公開調查結果，向死者親屬作個案交代。

然而，尋訪難屬之路不易走，其中不少在廣場及附近被打死的人，並非北京市民，而是來自外地。她們在廣東、四川、內蒙古等8個省份，就找到了21名難屬，天安門母親至今已找到200多名難屬，並整理死難者名單，記錄家庭背景和遇難情況，直至今今天為止，六四事件的死亡人數仍是個謎。早期中國官方宣佈死亡數字是241人，包括23名士兵，後來中國紅十字會估計有2,600人死亡，這與瑞士駐中國大使所估計的2,700相近。

2016年，丁子霖收到一名神秘男子電話，聲稱會在2017年「十九大」後與家屬商討賠償，但丁子霖以他不是代表官方為由拒絕。又據尤維潔透露，更早前有警察找過一位難屬賠償，但為丁子霖拒絕，並明確拒絕這種暗箱

操作的方式。

天安門的母親如此堅持她們的使命，卻賠上不少代價。走上前線的都遭受極大的打壓。丁子霖夫婦先後被褫奪教席，她們屢次被跟縱監視，限制出外，甚至遭到軟禁。事隔30多年，大部份這些母親已經年紀老邁，但她們的心，卻從沒有死去，正如六四死難者楊燕生的遺孀黃金平說：「31年了，我們艱難地行走在深秋的路上。陰霾擋住了陽光，我們痛得不能呼吸，不能言。但因為我們生命尚存，我們將堅持到底，砥礪前行，我們一定會堅持到底，只要活著。」

不過，最有效提醒我們毋忘六四的莫過於每年在香港舉行的燭光紀念晚會。自1990年起，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舉辦，每年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紀念活動，這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動，每年參加人為數萬至10萬不等，晚會內容包括誦讀六四死難者，及離世死難者家屬名單、致悼辭、默哀、獻花、播放民運人士及天安門母親的訪問影片等等。除了「平反八九民運」外，晚會還提出其他訴求，包括「追究屠城責任」「釋放民運人士」「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等，一直維持了30年。

2020年及2021年，香港特區政府以疫情為內，取消集會，2021年因國安法影響，維園集會被取締，支聯會亦告解散。我於2000年至2013年間在香港，曾數度參加維園燭光晚會，印象非常深刻！

我曾聽過不少朋友質疑說：「追尋六四的真相有何好處？現在的中國社會不是和諧完美嗎？這樣的資訊會不會傷害到我們中國的完美社會呢？況且，看看自1989年後，中國豈不是突飛猛進，現在已經是世界強國，在諸多的領域上都是世界的領導者。相反來說，若不是鄧小平堅定鎮壓，

消除一切影響國家穩定的反動，中國又怎會有如此的成就呢？」我相信他們的質疑或許都是發自內心，不一定是嘲諷之意，而是真誠的發問。

或許，我們要問：為什麼中國政府這麼緊張人民知道六四的真相呢？為了讓所有國民一起忘掉六四，不惜天羅地網的監視、媒體控制、教育洗腦、輿論左右，全面滲入人民思想，成功讓所有中國人集體認為，記住六四有弊無利，這樣作要付上的代價太大了。他們以為人民就不會記起這段歷史，但弔詭的地方是：就是中共成功改寫了歷史，讓所有人遺忘六四，偏偏記得最牢，最深刻的也是中國政府。2014年有一個人穿了黑衣，撐著黑傘在天安門廣場前拍照，一句話都沒說就「被帶走」，2015年四川維權人士陳雲飛為六四受難者掃墓，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被帶走，強大的中國政府竟然害怕這些已經老邁的老太太接觸國際媒體。其實，這類的小型活動，如果政府不處理，根本沒有人注意，政府這種態度，豈不是更提醒大家：六四要到了！

另一方面，我倒覺得這是一個「道德問題」，一如先前引用 Elie Weisel 的話：「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猶太人被屠殺，就好像在他們腦袋中把這些死難者在他們的記憶中再一次徹底地屠殺！」魯迅在三一八慘案後寫過一篇文章，名「紀念劉和珍君」，內容是這樣的：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

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了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
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不但是殺害，
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瘍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著就是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慘象，
已使我目不忍視了；

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我懂得哀亡民族之所以無聲息的緣由了！
沉默啊！沉默啊！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魯迅這番話，既適用於六四事件，也適用於日後香港的送中運動，為什麼我們總是沒有從歷史中學到功課呢？「失憶」「沉默」「謊言」「忘記」便是罪魁禍首了。在基督教的神學中，「記念」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義和信仰實踐！舊約時代，以色列人有逾越節，記念他們在埃及為奴的日子，及耶和華如何把他們從為奴之地領出來。新約時代，我們有「聖餐」，記念耶穌捨身流血，建立了新約。「記念」不只是記念「過去」，也記念將來，就好像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一章26節說：「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過去)，直等到祂來(將來)」，對基督徒來說，就是在最黑暗的日子，我們還是沒有失去盼望，盼望主的再臨，建立新天新地！正如邢福增教授在《為香港禱告》裡其中一篇禱文說：

“ 在看見的世界中，感悟那看不見的天國，
盼望所是，勇氣所在，信心所聚，愛心所賴，
公義所顯，真理所持！ ”

這也正是我們為六四事件的禱告！